

Y-24.15

武川文史资料

第四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
武川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一九八七年八月

目 录

我的回忆.....曹文玉（ 1 ）

打通要冲.....黄 厚（ 97 ）

大青山地下工作十年.....张二虎（ 103 ）

寻找回来的岁月.....刘耀冰（ 114 ）

鱼水深情.....武川妇联（ 126 ）

缅怀为抗日救国牺牲的烈士

——忆我父亲侯昶生平的几件事.....侯振国（ 129 ）

酒馆日本“警备队”始末.....张 贵（ 136 ）

辛亥年间归武地区几点史实.....张学义（ 140 ）

我的回忆

曹 文 玉

家 世

在我童年时，只记得我家的院子很大，房子也挺多，都很宽畅。有骆驼，有铺子，还有很多人，他们都很尊重我父亲，都叫他曹掌柜。我长大后，听父亲说，他并不是我的生父，母亲也不是我的生母，他是我的四叔，我的亲生父亲叫曹三三，我从前的家庭很穷，很悲惨，并把一切都告诉了我。一九五二年我在中共中央华北局工作时，回老家看望了一次，在当地部门的热情帮助下，查看了我家的家谱，至此，我才完全知道了自己的身世。

我的老家在山西阳曲县曹家湾，隶属太原郊区，离城约十里，自古以来是个重灾区。祖父叫曹延年，是个手工业者，以钉盘、碗谋生。父辈共弟兄五人，老大叫曹来成，老二叫曹永功，老三叫曹三三，老四叫曹补子，老五出世后，由于家庭贫寒无法养生，把他给了归绥市小西街我的一个老姨姨。我的生身父亲正是曹三三。

光绪年间，朝纲混乱，朝政腐败，百姓在满清政府的奴役下，痛苦不堪，衣不遮体，食不裹腹，生命财产毫无保

障。山西地区更是农田荒芜，民不聊生，再加上连年自然灾害的侵袭，百姓吃不饱，穿不暖，逃荒的人天天都有。听父亲讲，祖父很辛苦，他为了养活全家老小七八口人，靠自己的手艺，早起晚归，走村串户，四处奔波，为能多挣几个钱，有时一连几天在外，省吃俭用，用他那低微的收入来维持着生活，但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。光绪二十四年（一八九八年），祖父看到此地难以生存，听逃荒回来的人说后山绥远地区好些，便带着全家老小沿途乞讨，饿了吃点干粮，渴了喝口凉水，困了露宿村头或房檐下，经过半个多月，最后落脚在武川。那时，口外并不比口里强，人烟稀少，大片土地野草丛生，无人开发。看到这肥沃的土地，祖父带着全家在离县城三十多里的南乌兰不浪前柜村落居，一边揽活挣钱，一边带领全家垦荒置地，勉强维持着生活。但遇到灾年，还是揭不开锅盖。光绪二十六年（一九〇〇年），后山地区是特大灾年，粮草未收，饿死的人天天都有。我的二叔就是在这一年饿死在后山，留下仅有的一个儿子，东奔西跑，后也死在甘肃九泉。

听父亲说，我的生父曹三三是个老实的庄户人。自来到后山后，从不闲着，春耕秋收忙时，帮助祖父耕田种地收割庄禾。待农活忙下去后，便去武川县城的买卖字号中做零活儿、打短工，挣点零钱供养全家。由于他做工很卖力，从不投机取巧，任劳任怨，被万德昌的掌柜留当车夫，经常往返武川与归绥城内，运粮拉货。至此，家里的生活也逐渐好了起来。

民国八年（一九一九年），我出生在前柜子村，家里人见是个男孩儿，如获珍宝，疼爱至极。父亲更是高兴，早上

很早出去上工，拼死拼活地赶活儿，晚上早早地回家守在我的身边哄我、逗我，有时还从城里给我买一些简单的玩具。可好景不长，在我一岁多的时候，不幸降落在我们的头上。民国九年（一九二〇年），父亲在往归绥送货途中，路经蜈蚣坝时，惊车肇事，车翻人亡。这使全家人受到了一次严重的打击，尤其对我的母亲打击更大，哭得死去活来，痛不欲生，一连几天，饭不进口，觉不睡一时，整天抱着我忧虑重重；再加上不懂事的我吃不上奶整天哭闹，折磨得她面黄肌瘦，身体渐渐不支，几次产生了轻生的念头。亲戚邻里看到她那个样子，既担心又同情，经常开导她，安慰她，并常送些米面接济我们娘儿俩。在亲戚们的帮助下，为了我，母亲勉强打起精神，娘儿俩相依为命，过着煎熬的日子。光靠亲戚邻里的救济也不是长远之计，为了我们娘儿俩都能活下去，母亲决定改嫁。

母亲改嫁后，我被过继给四叔曹补子。以上这些事情都是听他说的。

养父曹补子是个憨实、厚道的庄户人。十四岁跟着祖父来到后山，一边帮助祖父料理家务，耕种农田，一边往返归绥和武川城内做工，后在归绥城一家字号里拉了骆驼，奔波于张家口、甘肃和新疆一带。由于他性格倔强，从不愿落在别人的后面，虽然年小，但装货、卸垛都是一人承担，从不请旁人帮助。自己拉得几峰骆驼都喂得膘肥体壮，掌柜交给的差事从不耽误，件件都使掌柜满意，赢得了掌柜的欢心，把他留了下来。随着岁月流逝，养父长成了大小伙子，他面目英俊，体格健壮，有着十足的男子汉气魄，手脚也更加勤快。掌柜看在眼里，喜在心上。不久，掌柜把自己唯一的女

儿许配与他，并亲自主持，陪了十几峰骆驼作为嫁妆，为他们举行了婚礼。从此，养父有了些资本，又在归绥城西顺城街开了个字号——世盛堂，除了搞驮运外，还经营粮食、皮毛、布匹、杂货等。后来，又在前、后柜村买下了一些土地，成了一个十足的务商兼农的坐堂掌柜。

我来到四叔家时，他已经是个小小的富翁。由于四叔妻室不生育，二叔唯一的儿子又死于甘肃，所以，他们弟兄三人只有我一个男孩儿。按照过去的迷信传统，我便成了三门中唯一接香火之人。因此，我一来，便马上得到了他们的宠爱，各方面都对我照顾的不赖。养父、养母更视我为掌上明珠，非常疼爱我，一有时间就守在我的身边。我生活在这样的家里，感到很幸福。

养父一辈子不识字，深知苦处。他为把我培养成人，在我七岁那年，叫我念了私塾。刚念时，幼小无知，不知道念书的重要性，只记得整天只是识字、背诗经。教书的先生手里经常拿着一根棍子，谁背不好，就要受罚挨打，我受不了这份洋罪，有时，不去上课。养父便设法哄我上学。后来，我看到有的孩子念书，他们的大人交学费并不是都给先生钱，有给米的，有给面的，还有的给衣物、洋烟等。我当时不太懂事，回去问父亲，才知道，他们并不是不想让孩子念书，只因家穷，交不起学费。听了父亲的话，慢慢地我才领悟到念书的重要性。有时，看到别的孩子中途退学时，那依依不舍的样子，我的心里也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。

由于家庭条件比较好，我整整念了五年私塾。此时，归绥城又成立了几所官立学堂，人们都叫洋学堂。有一天，父亲对我说：“现在又时兴洋学堂，你去上洋学堂哇！”就此，我告

别了伴我度过五年之久的私塾，迈进了“南高”（土默特小学）的校门。初来乍到，给我的印象是，这所学校与从前的私塾大不相同，老师很多，学生也很多，教室也很大，大部分学生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，穿着都很讲究，上、下课也很有规律，院墙两旁还长着高大的垂柳。就是在这里，我初次接触认识了乌兰夫、奎壁同志，并在他们的引导下，逐步走向了革命道路。

“南高”期间

一九三三年，我来到俗称“南高”的土默特旗高级小学读书。吃饭住宿都由学校统一分配管理。当时云泽（乌兰夫）老师是学校的庶务主任。不久，奎壁老师调来任教，担任了我们卫生课的老师。

云泽和奎壁老师对学生十分关心体贴，他们经常用自己的钱买一些东西送给学生。记得有一天晚上，我们正趴在炕上背课文、写作业，奎老师抱着一摞棉褥子轻轻地走进来，他给每一个体弱的学生铺上一条，又悄悄走了。后来听人们说，他给学生的这些褥子是用他自己的工资买的。有一次吃午饭，轮我去食堂打饭。雾气中，云泽和奎壁老师一边和大师傅秤量着莜面窝窝，一边对他说：“我们可不能克扣孩子们这点吃的，他们年令小，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要让他们吃饱。”他们还经常到饭桌前，问我们吃得怎么样，能不能吃饱。

记得奎老师给我们上第一课时，身穿蓝布大褂，上面还缀着几块补丁；脚穿牛鼻子鞋。他登上讲台，笑着说：“同学们，从今天起，我给你们讲卫生课。”转身在黑板上

写了“奎壁”二字，接着说：“这就是我的名字——奎壁。以后，我们就在一块共同学习、生活。”他走下讲台，一个个问着我们的名字，而后就开始讲课。他的课讲得深入浅出，易记好懂，又妙趣横生。

他的课讲得好，为人也和蔼可亲。所以，没多久时间，我们就和他混熟了。一有空儿，他就和学生们在一起。我们经常把他拉到柳树下，围着他让他讲故事，什么花果山、九官山、井岗山……。有一次正讲着井岗山的故事，突然，他停住了，比比划划地又讲起了猴爬杆来。说完，和我们一哄而起，爬杆、上树、打闹、嘻笑。原来是两个查学的人来了。那时，国民党政府惧怕革命思想的传播，对学校严格控制，经常派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到各学校，以查学为名，行特务之实。我听见那两个查学的人嘀咕道：“整天跟一群娃娃在一块猴爬杆，哪会是共产党。”

一天，他讲完了一段课，满脸笑容地说：“提几个问题，大家来回答，好不好！”教室里立刻活跃起来。他指着桌子问：“这是甚？”我们一齐答道：“桌子。”“谁做的？”“木匠。”他又指着教室问：“这是谁盖的？”“泥匠，瓦匠。”

“身上穿的衣服呢？”“纺织娘织布。”“裁缝缝的。”“妈妈做的。”接着他又问：“我们烧的煤是从那里来的？”“挖煤哥掏来的。”“怎么到这里来的？”不少同学答道：“火车拉来的。”“那么铁路是谁修的？铁轨是谁造的？”教室里一下哑了，没有人吱声。我们不明白他问这些干什么。他有些激动，提高声音说：“这挖煤的，修路的，造轨的，还有织布的，盖房的，都是工人，是创造世界的工人阶级……”就在我们听得入迷时，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摇铃声，打断了他的话。

他朝窗外瞥了一眼，换了个口气说道：“同学们，我们要讲卫生，要注意身体，有病早治，无病预防，……”这时，只见窗外来了两个查学的人，贴在窗前正偷听呢。原来，奎老师来到这里以后，结交了腿上有病的打铃老头，只要查学的人一到，便以铃声报信。

有一天放学，突然奎老师当着那么多同学的面说我调皮捣乱，不守纪律，叫我留下。我一向是个规矩的学生，心里有些不服。等教室里就剩下我俩时，他拍着我的肩头又夸我学习用功，字也写得好。随后又问我的年令大小和家庭情况，我都一一地告诉了他。接着，他又问我能不能听懂他的课，我马上说：“洗头洗脸洗衬衣，不喝生水剪指甲……”他摆摆手止住我的话，问我别的课也能记住吗？我想了一会儿，背诵起他的话来：“工人、农民用双手和血汗创造了世界一切文明，却身负三座大山，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。”等等。他打断了我的话，缓缓地说：“文玉，你要好好学习，将来要为工人、农民说话，为他们办事，去争取一个人人有事做，个个有饭吃，没有压迫和剥削的社会。”这时，他挺严肃地盯着我，说以后要让我办些事情。我一听就痛快地答应了。他还一再嘱咐我，这些事不要和任何人讲，连自己的爸爸妈妈也不能告诉。我感到了他话里的份量，心里不免有点紧张。

一天晚上，他把我领到学校隔壁的文庙大成殿，指着地上的一包东西说：“把它藏起来。”说完，他用手一指天花板，让我把天花板取下，在里面的墙上挖一个洞。说着，递给我一把烂菜刀，跳上香案，靠着墙壁蹲下身子说：“叫你咋干就咋干。快！蹬着我的肩膀。”当时，我有些踌躇，学

生怎敢站在老师肩上。他有所察觉，扭过脸说：“小小年纪，跟谁学得？快，利索点，要抓紧时间。”我犹豫了一下，马上站在他的肩上，挥动着烂切刀干了起来。我根据他的吩咐，先取下天花板，在里面的墙上掏了个洞，把那包东西稳妥地放在里面。然后，又用泥将洞口抹住，安上天花板，做得没留一丝痕迹。做完后，他为我拍打了身上的泥土，并且严肃地告诉我：“这件事除了你我知道谁都不许告诉。万一让坏人抓住，就是打死也不能讲出来。”我连连点头。后来他又拉起我的手走出大成殿，来到一棵树下，在紧靠树根底下，掏了一个能放传单的道。

第二天的傍晚，他又找到我，从昨天在树下挖的洞中取出一卷卷传单，低声地说：“文玉，今晚你把这些传单散发出去，要专门往人多的地方撒，象大南街，大西街，戏园子，饭馆里……有问题吗？”我干脆地说：“没有。”他又问：“往国民党警察局撒，敢吗？”我犹豫了，不是不敢，可怎么进去呢？他看出了我的难处，拉了拉我，随即他从地上拾起一块泥巴，用传单包上，然后做了个投掷的动作。我一下明白了，伸手接过传单，他帮我把传单放好，又安顿了一番。我马上行动了起来。

我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，看到这里的人挺多，就悄悄地从怀里取出一卷传单，一扬手，传单四处飞散下来，人们纷纷抢着看。接着，我又串了几家饭馆，等走出“同乐园”、“艳美园”时，怀里就只剩下一卷传单了。还有国民党警察局没有撒。我迅速走过独木桥，远远就看见了阴森森的国民党警察局，只见门前昏暗的灯光下，两个背枪的警察来回走着。我绕过警察来到西墙边，看看四周无人，弯腰捡起

块石头，拴在传单上，一甩臂，传单就落进了戒备森严的国民党警察局的院子里。

这时，夜已很深了。我怀着初战告捷的心情，急急地赶回学校，可奎老师还没有入睡，他一直等着我。

一九三五年，我毕业离开“南高”，上了大青山。在山中我又见到了奎璧老师。那时，他刚从延安回来。他拍着我的肩头说：“长高了。在‘南高’我就看你是个好苗苗。”此刻，我才知道，在“南高”，他是以教书为掩护，秘密地开展地下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。

出任乡长

一九三五年，我从土默特旗高级小学毕业回到家里。和父母分别二年，自然是一番亲热。在家的一些日子里，由于整天没多少事干，心里很是憋闷，父亲因此就常叫我帮他处理一些事务。

七月间，父亲在新疆联系下一批货。当时家里人手不够用，父亲又走不开，他老人家就把这事托附给了我。他对我说：“这批货很重要。我准备让吴八喜舅舅和你一块去。现在你也不小了，该出去闯荡闯荡，开开眼界了。”并一再叮嘱我在外要多听舅舅的话，不要胡来等等。说实在的，我从小就喜欢走动，从不愿闲着。这次让我出外办事，当然很高兴了。我和八喜舅舅等七月中旬骆驼喂起来后，打点好行装启程上路了。可临走时，父亲还是不放心地又嘱咐了半天。

这次出远门，的确大开了我的眼界。沿路不断有逃荒乞讨的人群和拦路抢劫、无所不为的土匪。更气人的是过关

卡、进出城门都得给警察和当兵的一些钱，这样，他们才不太为难你，放你通行。如不给钱的话，他们就借口说你违反了这，违反了那，你就得在这里呆上几天，甚至十几天，说情也没用。有时，就要把货物扣留没收。有一次，在回来的路上，经过一个关卡，当时是国民党政府设立的税卡，按驮货物种类的规定，我们如数交了税金，可他们却还是不肯放行。我看不惯他们这种行为，就和他们嚷了起来。双方差点打起来。他们借口说我们驮的货有禁物，把货全扣压了下来。第二天，八喜舅舅把我说了一顿，又给了几个当兵的一些钱，苦苦求情，我们才通过了税卡。

十月份，我们回到了家。此时的后山已感到了寒意，河沟里已结下了薄薄的一层冰。就在我不在家的这段日子里，没想到父亲已为我订下了一门亲，又在武川南乌兰不浪为我买下了一些地。我不愿意这么早就结婚，可在父亲的强迫下，没办法，我答应了这门亲事，在武川后柜村安了家。新婚不久，由于闲着没事做，实在是坐不住了，就来到“南高”找到奎老师，恳求他给我找个差事。

见到了奎老师，师生寒暄之后，我就提出了我的要求。当时，国民党中央和日本帝国主义刚刚签订了《何梅协定》和《秦土条约》，断送了河北和察哈尔两省的主权。日寇正加强兵力大规模地向华北五省进犯。奎老师想了想说：“现在不是我们考虑自己饭碗的时候。你先回去，在你那片地方多交些朋友，多接触民众，将来我会给你找些事做的。”

第二天，我返回了家乡。回村后，我照着奎老师说的，经常和一些穷苦百姓在一起聊天，借此，和他们交朋友。过了些日子，奎老师派了个木匠来找我，让我进归绥城，说有

事商量。接到信后，我没敢耽误，立即进了城，我向他汇报了这些日子的情况，他说：“你做得不错，现在我给你找下个差事。让你回去当五合乡的乡长。”我一听便傻了眼，我怎么能当乡长呢？当时，我岁数太小，怕别人信不过我。奎璧同志看出了我的相犹，他一边鼓励我，一边坐到桌前，拿起笔给武川乡村建设委员会的总干事梁振花写了一封信，把我的情况作了一番介绍，要我把原五合乡的乡长张二瑞换下来（张二瑞因贪污被贬职），请他发委任状。然后他把信交给我，说：“你可别象有些人那样当乡长。要记住，一不能向群众要钱；二不能向群众征粮；三不能向群众拨兵，要当个为民作主的好乡长。”

回到家后，我托人把信带到了县里。过了不久，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骑着马来到了乌兰不浪村找到我，问侯之时，我才知道他就是梁振花（俞县人，当时在武川做地下工作，直接与奎璧同志联系。），他很健谈，语气直爽，所以，初次见面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当说到五合乡乡长一事时，我腼腆地说：“我这么年轻，恐怕干不了。”他却很坚决地说：“那不行，委任状我已经拿来了，你非当不行。”我看再没有商量的余地了，便答应了下来。随即他又告诉了我当乡长注意的事项和一些工作方法。

就这样，我走马上任当上了五合乡的乡长。工作中，我按照奎璧同志和梁干事说得去办。不摊款，不纳粮，不抓丁，同时和乡里的百姓交朋友、拜把子，关系甚好。每次遇到县里来人，总有人给我通风报信，我便躲到山上。来人找不见我，有事也办不成，又不愿在乡下久住，只好悻悻而回。

在我当乡长将近三个月的一天里，家里突然来了五个人，手里拿着奎璧同志的信。信上说，这些人是做生意的，要去百灵庙一带行商，让我给开张路条，帮助解决交通工具和途中干粮。我见是奎老师介绍来的人，当即写了路条：此行五人，去百灵庙经商，沿途予以放行。又找来几个亲戚朋友，做了几十斤白面饅饼和馒头。干完这些事后，我跑到东土城红卜儿的枪盘河一个更敦老太太家里，以乡长的身份，从他那儿雇用了五峰骆驼。第二天一早，我送他们五人出了村。这件事直到解放以后，我遇见了其中的熊世昌同志，才知道他们当时是去百灵庙执行任务的。

受“国民兵第一期”训练

这件事过去四、五天后，我又接到奎璧同志的信，要我马上进城。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连夜赶到了归绥城。一见面，他就说：“你的工作完成的很好，赶紧把乡长辞了。”一句话把我闹了个莫名其妙。看见我惊奇的样子，他告诉我说：日本帝国主义策动亲日派汉奸们在华北搞什么“五省自治运动”，德王也同日本人勾结在一起，组织“内蒙古自治军政府”，还指挥伪军向绥北和察北进犯，现在的局势十分危险。接着他又说：“你回去先把乡长辞了，以后我给你找份比这更重要的差事。”我当乡长整整三个月了，乡公所里有乡兵、记账先生和伙夫。三个月来我一个响钱也没给他们发过，那能就这样欠着债辞职。我向奎璧同志说明了这个情况。他听后，从身上取出十块大洋说：“把这带上，若不够，你再卖些地，我们可不能欠账。”

回到乡里，我卖了四十亩地，加上奎璧同志给我的十块

大洋，总算结了账。把乡兵、记账先生和伙夫打发走后，我也回了家。当时，五合乡地区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：曹文玉当乡长愣不焉焉，卖了四十亩地也没落下个好人情。我对这些话也没放在心上，心里只盼望着奎璧同志再给我新的事做。

一九三六年，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三省后，继而又向全国各地进犯。全国各地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。绥远地区，傅作义将军成立了“国民兵训练队”，目的是短期培训一批从各地抓来的壮丁，作为备战军，使其招之能来，来者能战，为抗战做好充分的准备。

就在我辞掉乡长不久，梁振花又来通知我，叫我去“国民兵第一期”训练队接受训练。我一听是叫我当壮丁，心里带气回绝了他。也许我的话有点太生硬了，只见他低着头坐在那儿，好半天没说一句话，有些尴尬。于是，我缓和了一下说：“况且，我是独生子，不应该让我去。”梁干事抬起头看着我，良久，才说：“这些我都知道。这次让你去训练，是奎老师的意思，主要是想让你学点军事知识，为将来打基础。”我听到是奎老师叫我去的，心里虽是快快不乐，但也痛快地答应了。同我一起走得还有本村的三个小伙子。

“国民兵第一期”训练设在归绥市小教场，学制四个月。司令员叫李大超，东北人，原是张学良推荐给傅作义的“三太宝”之一，此人长着一片好嘴，能言会语。他刚来时是少校，很快便晋升为中校、上校。干了一段时间不干了，由民政厅厅长袁庆臻兼任。

刚去时，我被编制到“国民兵第一期”第六大队第十七

中队，大队长叫傅金贵，河北人；中队长叫魏思泰。大队是营的编制，中队是连的编制。第一期培训的壮丁共三千多人，每人都发给一身训练服。时隔二、三个星期，傅作义亲自到场给全体国民兵作一次精神讲话，鼓舞大家好好训练。训练的科目有：整队、出操、射击、隐蔽、进攻、防守、俯卧等。

在此期间，我没见过父亲一面，就连这一阶段的训练也瞒着他，但又整天担心他老人家听不到我的音讯着急，所以，时隔一月半载写一封信回去，让他老人家放心。

出任乡大队长

四个月的训练不知不觉地过去了。训练完，我去探望了奎老师，并把这次训练的情况告诉了他，奎老师听后，说：“你已经掌握了不少军事知识，这次回去当个乡大队长干干，我已经给你联系好了。”接着，他一再强调，在就任期间，对青年人边训练、边团结，树立自己的威信，等等。从奎老师那儿出来，我看望了父母亲后，就返回了五合乡。

回家的第三天，上面派人送来了任命书。上面写着：任命曹文玉为五合乡乡大队长。署名为县保安队大队部。我接到了任命书，一连几天没去报到。事隔四、五天，县保安队副队长姓史（其名不详）特来找我，催我上任，就此，我向他请教了工作的开展方法和一些规定。

当时，武川十大区共有两个保安大队和一个县直属小队，各区都有一个保安队，各乡也设有乡大队。为了统一领导，县政府又成立了保安分处，县长畅维兴兼任处长。

五合乡乡大队，属县保安队所管，共约三十多人。我是大队长，副大队长叫朱四娃（官名朱存礼）和孙良忠，队员都是五合乡经过“国民兵第一期”训练过的学员。上任期间，我按奎老师和史副队长的吩咐，每个礼拜六，集中队伍操练一次，借此和他们交朋友、拜把子，关系甚好。不久，“国民兵第二期”的学员回来后，我又把他们吸收到乡大队。同时，又发展了一批青年，乡大队由起初的三十多人增到六十多人，逐渐壮大了起来。虽然队员增多了，但人多枪少。当时，每个乡县政府只卖给四、五支步枪，而且都是些旧枪，有的已不能用了。我去了县里几趟千方百计想多要些枪支，但只要了六支步枪。其中，有一支不能打了，三支连珠步枪都有点滑机，还有两支阎锡山造的“六五步枪”，勉强可以使用。

转眼又是一年过去了。一九三七年春季的一天，梁干事、白银魁（武川县乡村建设委员会副总干事）和县保安队的史副队长一同来到五合乡，传达了上面的指示。梁和史暗中又给我透露了奎老师的意思，让我把国民兵一至四期的学员尽快收集起来，说有新的任务。他们走后，我即着手开展了这项工作，先后在义和乡、义美乡以及六区的四合义、霍筒子、下营盘等地，又收集起受过训练的国民兵学员几十人。集训一个阶段后，上面又传来了梁的指示，让我把队伍暂时遣散，等待新的命令。

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，“芦沟桥事变”发生后，日本侵略者有计划地向平、津等地以大兵力进攻，继而又很快向绥远地区推进。一九三七年九月间，绥东大部分旗县沦陷，陶林县城失守，武川危在旦夕。